

爱国思想是中国近代志士仁人共同的高尚品格，作为先进中国人之一，甲午战争更不例外。他从甲午战后提出《救亡决论》，到临终前告诫家人“儿女们，须知中国终不灭，始终都是心系祖国、热爱祖国的。他的爱国思想从甲午战争时期开始释放出来，就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先是反对轻言战，后又反对轻言和，主张抗战到底，既反思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又相信自己民族能够并列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开放与竞争之世界意识，等等。他把救亡图存与民族反思、国际竞争、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具有与前人和同时代人不同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给人们的启示是：

首先，战与和是伴随战争而出现的两种社会现象，是作战双方的策略。有人把战与和当成人们评判爱国、误国、卖国的一种行为标准，这显然是为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妥协，主战或主和，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苏中立 涂光久 / 著

其次，反思与自信是民族意识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

严复思想与近代社会

中具有浓厚色彩。近代中国的爱国志士，在甲午战争后，面对民族危机，在强烈的革新意识，构成了民族觉醒与进步的起点。

再次，开放与竞争是世界意识的突出表现，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条件，是立足世界来观察自己民族的精神境界。严复在其中的清醒认识，

严复思想与近代社会

苏中立 涂光久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复思想与近代社会/苏中立 涂光久 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07

ISBN 7-5034-1728-5

I. 严... II. ①苏...②涂...

III. ①严复-思想②近代社会-研究 IV. F29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06)第131341号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车参兵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市太桥大街23号

印 刷:北京利民印刷厂 邮 编:100014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9

版 次:2006年0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6年0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绪论	(1)
----------	-----

爱国·经世·近代化

甲午战争时期严复爱国思想的特色	(17)
严复经世致用思想的独特性	(31)
世纪之交严复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近代化比较	(50)

文化观·启蒙思想

戊戌时期严复的中西文化观	(64)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西化思想与文化模式	(76)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启蒙思想的特点	(94)

大同·社会主义

戊戌时期严复和谭嗣同的理想社会模式之比较	(98)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和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模式之比较	
.....	(111)
严复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	(125)

天演·进化

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的时间考评	(138)
严复选译《天演论》的原因和主旨	(149)
天演、进化、进步的内涵及其关系	(157)
严复对《天演论》的改作	(166)
《天演论》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	(190)

研究概述·述评

百年来严复研究的发展概述	(205)
纪念严复诞辰 150 周年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综述 ...	(227)
《严复年谱》简评	(235)
《严复大传》述评	(242)

附录

简评《执中鉴西的经世致用与近代社会转型》 兰州大学教授 王劲	(249)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3)

绪论

这是我们合写的一本论文结集,其中半数曾经公开发表过,还有近一半的文字是近几年来撰写的。

我们两人于1956年8月同时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既是同班同学,又是湖北同乡,还都是调干生。两人分别于1960年和1961年在本科和研究班毕业,在吉林省长春市学习4——5年、工作了近20年。1979年两人同时调入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只工作了16年左右就退休了。1995年和1996年两人先后退休,至今已10年有余。45年来,我们一直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工作,始终抱着敬业、实干、诚信、奉献、创意、奋进、严己、宽人的人生态度,退休以后仍然执著于自己认定的这个职业,并继续参加学术活动,从事科学研究,因而才有这本文集在今天的问世。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哲学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划时代的世界文化巨人。他的活动和思想中,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我们这本研究严复思想的文集,就是一种尝试。本文集除了绪论、后记和附录外,分为五个部分,按内容而不是按时序分类,将内在联系比较紧密的篇目放在同一类。

第一部分是“爱国·经世·近代化”。这三者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爱国思想是中国近代志士仁人共同的高尚品格,作为先进中国人之一的严复更是这样。他从甲午战后提出“救亡决论”,到临终前告诫家人、儿女,“须知中国终不灭”,始终都是心系祖国、热

爱祖国的。他的爱国思想从甲午战争时期开始释放出来,就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先是反对轻言战,后又反对轻言和,主张抗战到底;既反思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又相信自己民族能够并列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开放与竞争之世界意识,等等。他把救亡图存与民族反思、国际竞争、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具有与前人和同时代人不同的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给人们的启示是:

首先,战与和是伴随战争而出现的两种社会现象,是作战双方的一种具体政策;有人把战与和当成人们评判爱国、误国、卖国的一种行为标准,错误的认为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妥协投降;实际上,无论主战或主和,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反思与自信是民族意识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一个民族优秀的心理素质和精神传统的体现,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感的表现;民族反思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之后所出现的一种常见的思想文化现象,在中国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是鸦片战后,一部分先进的志士仁人,面对民族战争的失败,在比较了中西文化各个层面差距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具有浓厚启蒙主义色彩的深沉的爱国主义形态,浸透在其中的清醒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革新意识,构成了民族觉醒与进步的起点。

再次,开放与竞争是世界意识的突出表现,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条件,是立足世界来观察自己民族的精神境界,既包含认识世界潮流和趋向,也包含认识自己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以及如何使自己民族参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谋求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爱国思想与经世思想是紧密相联的。所谓经世致用是指面对现实,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运用古今中外之学为当前现实服务,力求实事求是的一种人文精神和学风。它具有时间上的当代性、内容上的实用性、学术上的综合性、致用上的广泛性等特点。可以说,经世致用的出发点是爱国,它遗存下来需要弘扬的内

容也包括其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一般来说,学术界已很重视严复的爱国思想,但对其经世思想则很少研究。实际上,严复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存在的,只不过具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是用西学阐发中学中的经世微言,如修齐治平、修己治人、人伦道德、科学民主等;二是不仅主张经学经世、史学经世,而且强调西学经世;三是将尚实中的实学与实用和实用中的内在修身与外在治事统一起来,并将传统中学与近代西学贯通其中。

严复提倡尚实崇真的态度和作风,反映在严复为人、为学、从教、从政的各个方面,如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严谨踏实、身教重于言教的教风,实干、实效、实功的政风,朴实无华的作风,等等。严复的一生可以说是务实致用、探索求真的一生。

严复经世致用思想中的入世治事、尚实崇真、为学有用、达用适时、尊重科学、注重道德、器德兼进、与世推移、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合群爱国等基本精神,对于今天为人、做事乃至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近代的经世思想又是和近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经世致用不仅是旧学转向新学之桥梁,而且是实现近代化的内在动力。它在近代的条件下,既促使人们面对现实,要求近代化,又促使人们学以致用,实现近代化。如从修身论到人的近代化;从治国论(包括富强论与民主论)到实现军事、经济、政治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教的近代化;并要以西方的近代化为鉴戒,在着力进行物质建设的同时,注重抓人的心理道德建设。后者正是近代志士仁人在追求和实现近代化过程中所孜孜以求而未能解决的困惑之一。

严复除了在论述经世致用思想时涉及近代化的问题以外,他还特别强调伦理思想的近代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严复的伦理思想基本上属于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他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契机,将中西伦理思想的巨大储能释放出来,即用西方

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伦理思想:第一、批判三纲,对五伦既有批判、又有保留。第二、对传统道德的扬弃,如在道义与功利上,主张义利合;将仁爱与竞争调和、统一起来。第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直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等等。世纪之交,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则属于过渡形态,他以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为契机,逐步由传统向近代转化。首先,孙中山在“幕古”的心绪下,利用旧的伦理道德规范——“忠”、“仁”、“义”、“和”等来宣传新的伦理思想内容。其次,在“开放”的旗下直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伦理思想。

综观世纪之交严复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既有其相同之处,又有其相异之处。他们的伦理思想近代化并没有完成,他们是在外力压迫下实行的一种被动的近代化,是难以成功的,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诸如伦理思想近代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伦理思想近代化是中西伦理思想的整合创新,严复的渐进与孙中山的激进是相对的,等等。伦理思想近代化比起物质近代化和政治近代化,更难为国人所理解和接受。

第二部分是“文化观·启蒙思想”。两者之间也是联系着的。因为严复的文化观和启蒙思想都离不开西学的输入和吸收,而在中国近代的特殊环境下,介绍西学与启蒙大体上可视为同一进程。这里所说严复的文化观,主要指他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重点又是探讨戊戌和辛亥两个时期。

《戊戌时期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一文,包括更深层次的反思,中西文化之比较,标本并治与中国近代化。重点在阐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提出标本并治,主张以开民智为中心,实现文化的创造者人的近代化,即“治本”,以促进文化客体——军事、经济乃至社会制度的近代化,即“治标”。以为这样,既能“救目前的溃败”,又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富强问题。

《辛亥时期严复的西化思想与文化模式》一文,包括西学愈愚的契机,西化思想的内涵,文化模式的新趋向,文化融合与辛亥革命。重点介绍严复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全面改造中国以实现近代化的思想。第一、严复的西化思想,从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方面来说,主要是天人会通的进化论,群己权界的自由观,立宪法制的民主观,义利结合的伦理观,实测内籀的方法论。这些内容反映了严复力图使西方思想中国化的意向。第二、严复虽然主张西化,却并非全盘西化主义。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模式,是取代夷夏文化模式和中体西用模式的新趋向,也是他对待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第三、文化观上的中西融合,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新旧调和,“每持一义”,都必须使之“无过不及之差”,因而与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形成了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各派都利用他这面旗帜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使他的思想对辛亥革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是指明中叶特别是鸦片战后一系列走出中世纪的自我批判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促进近代社会的建立。严复的启蒙思想发端于甲午战后,兴盛于戊戌维新,而它的深入发展则在辛亥革命时期。他除了把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之外,更多的则是翻译西方名著,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和民主制度,如前所说,主要是进化论、自由论、民主论、功利论、实证论,等等。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启蒙思想》一文,原本讲了三个问题:一、愈愚救国的启蒙大师,二、西学愈愚的启蒙思想,三、愈愚启蒙的历史特点。前两部分内容与前述文化观的内容基本一致,故只录其第三部分。综观严复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启蒙思想既从救国思想出发,又未完全受救国思想

的制约;2、启蒙思想既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樊篱又未完全脱离传统思想;3、启蒙思想与实际行动的趋向与悖逆;4、主客相悖的社会效果。严复的启蒙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它的进步性,并对当时和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功是不可泯没的。

第三部分是“大同·社会主义”。传统大同思想是两千多年来中华人文精神的精华之一,是中华民族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模式。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一般是指源于西方的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也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二者有着相通之处,有的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理想的民族。理想既是目标,又是动力,它激励志士仁人人为之奋斗不息。古代如此,近代亦然,严复和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英勇战斗的卓越代表。

严复和谭嗣同根据戊戌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将传统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的近代社会主义架接起来,实现了大同理想的转型,设计了未来理想社会模式——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可谓“大同太平——至治极盛”说;谭嗣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可谓“升平太平——小康大同”说;二者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大同理想社会模式,前者侧重于最高理想社会目标,后者则明显地分为二级理想社会目标。

严复和谭嗣同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在旗号、层次、思想资源、理论基础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在思想渊源、具体内容、实现途径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他们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强调首先要向西方学习,实现机械化,发展科学,达到国家富强的近期目标,这是现实的,可取的;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大胆追求,也为以后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他们具有一致的远大理想,但他们实现理想的途径却是多样的,谭嗣同热心于政治活动,严复致力于思想启蒙,都为实现近期和未来理想目标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社会进步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功不可殁。严复和谭嗣同在甲午战后“学问饥荒”的环境之中,冥思苦索,绘制理想蓝图。然而,谭嗣同对西学了解甚少,严复对西方社会主义亦知之不多,他们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有消灭贫富贵贱差别、要求人人平等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肤浅的。

20 世纪的头十年,一般称为辛亥革命时期。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之后,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车轮突然加速了步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均加速向多元方向发展,思想领域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其主线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严复和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模式都是爱国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其思想主线相一致,即先救亡——继富强、民权——后大同。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一般路径,具有普遍性,孙中山和严复的突出之点在于他们自觉地显示了这一路径,具有典型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可以说是“大同至治——均平社会主义”,这一模式反映了严复将西方的社会主义和中西古代的均平、治道结合起来,设计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善良心境。而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模式则可以说是“太平均平——民生社会主义”,这一模式反映了孙中山将西方社会主义移植到中国,准备结合中国古代理想的均平思想和太平之世以及当时的社会实际进行实施的良好愿望。

孙中山和严复都出生在早期开放的东南沿海省份——广东和福建,又都受了十几年的新式教育,并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基础。甲午战争爆发后,年正 29 岁的孙中山和年已 41 岁的严复,分别在海外和国内走上了革命与维新的道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投身革命共和,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两人的理想社会模式也因此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两者的相同之处,除了都是爱国思想的逻辑发展之

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都以进化、人道作为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论基础;都把现代化和均平作为理想社会的主要目标;都是中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严复和孙中山理想社会模式的相异之处:一是在均平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孙中山的侧重点在强调“平均地权”;严复的侧重点则在强调民之智、德、力的均平。二是对理想与现实之关系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孙中山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贫富之悬隔”没有欧美那么严重,“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不但为“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而且实行起来较欧美“为易”,“且易得许多”。严复则不同,在他看来,优胜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还只是一种未来的崇高理想,所以他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提到议事日程,认为那是遥远的未来之事。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还处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落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说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显然是一种过激的主张;而将社会主义推之于遥远的未来,也有失偏颇。但是,严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消除资本主义的祸患是未来之事,和孙中山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实行社会主义更容易的观点相比较,前者显得更为成熟和深刻。

在有关研究严复思想和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论著中,很少谈到严复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有的虽然涉及了,但也比较简略。实际上,严复在一生中曾不断地论及社会主义。上述两文——《戊戌时期严复和谭嗣同的理想社会模式之比较》和《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和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模式之比较》中,已从比较的角度论及了严复的大同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严复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一文中,则对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将严复论述社会主义的过程、内容、特点、性质等问题,分别作了阐释。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严复在1895—1921年的论著和译著中都

有论述,27年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5—1898年。在这4年中,严复曾多次谈到修齐治平、至治极盛、均贫富之党、治世、井田之制、大同之学等等。第二阶段是1899—1911年。在这13年中,严复除了谈及修齐治平、井田之制、大同之世外,还谈到了兼爱、至治之世、至德之世、小国寡民之世,以至社会党、虚无党,甚至明确提到了社会主义。第三阶段是1912—1921年。在这10年中,更是反复谈及大同和社会主义,不仅谈到欧、美社会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提到欧东过激党、俄之社会主义。

严复论述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非常广泛,其主要之点有三个方面。1、关于社会主义兴起的原因。他反复地从多方面论述了贫富不均足社会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2、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他从生产、分配、生活、政治、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等多方面,设计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尤其是对全球现代化和人的德、智、力三者均平的设计,独具特色。3、关于社会主义的实现问题。他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春秋》之所谓治世,“今欧人有其几,或千年之后能有之”。

严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特点:1、救国救民思想的逻辑发展。严复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从爱国思想出发的,其爱国思想集中体现在救国救民方面,而救国救民思想的逻辑发展是:先救亡,继富强,后大同。2、突出均平。严复一方面充分揭露前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均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均平的社会。所谓均平,既包括古代圣人的“均其不齐”的主张,也包括近代已经实现了的均平事实,更包括未来理想社会中将要实现的“民之德、智、力、品”的均平等。均平是中外古今各种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主张大体上均平的。严复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均平,正说明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致性。3、中西

结合。中西结合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历史的必然。严复坚持用西学开发中学,既介绍传播了西方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又挖掘了我国古代的民主因素和乌托邦思想,从而使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中西结合的时代特色。4、和民主主义相结合。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也是近代志士仁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时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既反映了近代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联性,也反映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早熟性和不成熟。

严复的社会主义观比较复杂,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其基本性质是属于近代改良社会主义思想。

严复在论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的谴责和对劳动者的同情,对美化远古时代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是至治极盛的言论的质疑和批评,对生产交通现代化、生活富裕欢虞、兼爱平等、势均才殊、郅治民主、民之德、智、力、品既优秀且均平、人的素质普遍提高等的设想,给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肤浅的,对科学社会主义是怀疑乃至排斥的,他还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了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些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理想社会模式一般属于超前意识。超前意识是指人们对现实的超前性反映,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超越了当下现实的实际发展,其追求的不是已经实际存在的“实然”,即人类事件的实际过程,而是尚未发生的“应然”,即人们对实际事件发生状况及社会生活演变态势的预设和期望。这种超前意识是理想社会模式的一般特征,也是先进思想家(有的兼杰出政治家)的共同特征,如果没有超前意识,就不成其为先进思想家,也就没有什么社会理想和启蒙思想了。但是,要使这种超前意识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变为社

会的实践,使之与现实可操作性统一起来,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在运作中不顾主客观条件,急于求成,就会犯冒进的错误,欲速则不达。思想的超前和运作的稳健,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在野的不承担具体社会责任的思想家,比较容易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所发表的观点比较激进,具有超前性,往往超越当时的社会承受能力,却为下一阶段的人们所接受并身体力行,因而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而一些在朝的面对现实并承担具体社会责任的实践者、改革者,不论他们的思想如何开明,所阐述的思想和所持的政治态度总是较为缓和,具有保守性,但却与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较为一致,在当时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并能使社会在渐进中得到稳定和协调健康的发展。这不仅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今天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时值得注意的实际问题,应该引以为戒。

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应该是一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诸领域都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一般来说,它是在继承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胜于资本主义的。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全部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即使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要补上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课,使其建立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只有生产力是先进的,然后才能要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相应的变化,后者的变化又促进前者的发展。这样,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最终进入最理想的高级阶段,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性认识。

第四部分是“天演·进化”。一般人认为天演即进化,严格地说,二者具有一致性,但不是对等概念。

《天演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一百多年来,

人们对它的研究长盛不衰,涉及问题殊多,该书就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的时间、原因、主旨、内涵、改作、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文进行了阐释。

关于《天演论》初稿的译述时间直到现在仍有三说:一是1895年,二是1896年,三是1894——1895年或1896年,存考。以上三种观点,均有自己的根据,似乎都言之成理;但三者比较,1896年说,理由更充分一些:一则有直接的证据,即严复的《译〈天演论〉自序》;二则旁证材料比较充分,如梁启超、吴汝纶、叶尔恺等人的书信、日记、年谱等;三则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的1895年说,没有直接材料根据,并与吴汝纶自己的记载相矛盾;四是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天演论》本,书面所标时间(1895年)与书中所述时间(1896年)相矛盾,赫氏原书出版于1894年7月之后,1895年4月就出版译著重刊,似乎不太可能。总之,严译《天演论》应完成于1896年。

关于《天演论》的正式出版时间及版本。一般都认为是在1898年上半年出版的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正式本。具体有4月、6月、夏季之说。实际上,应是光绪二十四年夏季,具体时间为1898年6月至9月之间。

关于严复选译《天演论》的原因。严复为何不译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著作,而要译赫胥黎的著作?主要原因是:1、是文本的难易程度不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长达400余页;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更是长达十集,为论数十万言;而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严译名《天演论》),只有60多页,又是最近所出。三者比较,《天演论》是“小书”,“简约”,不难“通译”,故择而译之。2、是内容适应现实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主要是变的思想影响深入,辛亥革命时期,主要是民族思想影响深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是伦理道德深入人心,而一而贯之的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强、合群、保种。3、是具有发挥学术思想的空间。《天